

赵东艳
编著

新旧浮沉

变法之争

● 中国王朝内争系列 ●



出版者的话

历史是人类知识、智慧的积累，是先辈留给后代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故言曰“读史使人明智”。不过，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要读一部煌煌历史巨著，对许多人来说，不下非常的决心，恐难静心卒读。即便下定决心，恐怕是纵有开头，亦难有结尾。鉴于此，我们规划出版了“中国王朝内争系列”。

我们这套书的出版，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即高雅的学问通俗去作。我们觉得，在学术界有一种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学术高居文雅的殿堂，做守高不可攀、曲高和寡的自尊，以理性、冷峻为美。这种清高和自尊，我们是很钦慕的。但是，思想和知识，是需要传播的，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一代传一代，思想才能成为不朽，知识才能成为永恒。所以我们请专家学者，走下殿堂，靠近民众，在雅和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俗，不是低俗，不是粗俗，更不是媚俗，而是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观点，用清新雅丽的语言、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华采辞章，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再现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鉴。

历史是异采纷呈的，是博大精深的。我们涉足历史，并

不能因这几本小书，就奢望趟过历史的每一条河流。经反复论证，征求学者的意见，决定围绕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展开论述。首推《血溅龙袍——皇位之夺》、《宫闱风波——宠位之惧》、《朝臣倾轧——相位之斗》、《群雄逐鹿——割据之战》、《朋党误国——帮派之乱》、《忠奸分庭——善恶之辨》、《新旧浮沉——变法之争》、《文网血泪——文字之祸》。从八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再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手段和方法的残酷性和阴险性。他们有的为了国家大业，忍辱负重，矢志不二；有的身不由己，莫名其妙地成为牺牲品；有的为了一个权字，朋友可以反目，兄弟可以成仇，甚至刀剑相加，同室操戈。当然历史是复杂的、矛盾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能以简单的善恶来做终极评判，也不能因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而否定其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不能因其有益于社会，而赞成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而应该历史地、客观地评判。总之，经过作者独具匠心的条分缕析，一条是非、善恶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追览历史的风风雨雨，而且可以了解史学家的观点和其对历史的客观评价；不仅可以目睹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厮杀，而且可以掩卷沉思，得到历史的启迪。

不过，这八本书的表现形式，仅是一种尝试，还有很多不尽人意处，比如体例、写法上，因作者不同，差异是难免的。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读者朋友的认可和诚恳的批评、指正。

出版者

1996年1月

前 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新与旧的斗争就像这绵延不息的岁月一样，与历史发展相伴。新与旧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是社会之所以进步的根本所在。

然而，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充满了艰辛与苦涩，充满了斗争与血腥。翻开历史画卷，无数新与旧纷争的场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旧势力的血流出来了，许多仁人志士倒下了。这就是斗争的残酷，历史的无情！

综观新事物发展的历史，新旧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

首先是在各个历史转折时期，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斗争。如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商鞅等一批改革者与奴隶制不懈的斗争；封建制末叶，资本主义崭露头角，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的诞生。

其次，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危机威胁着政权生存的关键时刻，统治阶级有识之士为拯危救难，而进行的社会变革中与旧势力的艰苦斗争。如北魏的孝文帝、宋代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张居正、清代的戊戌维新派等都属于这一范畴之改革者。

此外，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是对旧制度沉痾的打击。而当被统治阶级的暴力革命摧毁了

旧政权，统治阶级又重建新王朝的时候，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往往能对旧政权的弊政做以调整，这都是新旧交替的重要内涵。

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这正是中华民族辉煌过去以及灿烂的今朝！

基于本书篇幅，我们只把那些历史转折时期以及王朝危难时期的新旧斗争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去认识它，回味它。在惊涛骇浪的历史沉浮中，每当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它总受到旧势力的强大阻拦，正因为此，新事物总是不断受到波折、创伤乃至暂时消亡。但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却生生不息，它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无可辩驳，它给人们留下的财富更是十分丰厚的。新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而新事物最终要战胜旧事物，历史就是这样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着。

商鞅变法是与旧势力激烈斗争取得成功的典例。虽然商鞅命运十分悲惨，竟在死后还被施以车裂之刑，但是，它与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亡政息的改革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却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政治、经济改革是否协调一致、相辅相成；是否有强有力的法律做保障；改革者的自身素质以及位居人君的最高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改革意识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决定改革成败至关重要的。另外，当一个制度代替另一个制度的历史大潮来临之际，只要改革者顺应潮流而动，再加上改革者自身的智慧与才干，就很容易取得成功。商鞅正是处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时期，他感受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建立了丰功伟业。而王安石与张居正的改革却与此不同。他们是处于封建政权已走向衰弱，王朝之弊已积重难返之际，这些志在

有为的中华精英欲励精图治、拯危救难。但是，危机的王朝走向没落与垂死，正如新兴的制度走向繁荣与昌盛一样不可逆转！

诚然，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也可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期封建制灭亡资本主义产生之际的产物。但它是当中国封建大门被外国洋枪洋炮打开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掀起的学西学、办洋务的运动，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企图以特殊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虽然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国还没有兴办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洋务运动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历史潮流，而洋务运动更多具有的也是维护那千疮百孔的封建制度为目的，以西学补救中学，必然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启蒙意义极其深远，只有在此时，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才知道，自己的身外还有一个先进的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拯危救难的改革可谓层出不穷，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以及清朝灭亡前的维新运动，都属于这一范畴。在王朝衰微、江河日下之时，少数改革家的孤军奋战无以扭转乾坤，失败的命运也是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与旧势力的抗争，才使无数后来的人们勇往直前、战斗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改革者，他们以先进的汉族文化为楷模，艰苦创业，勇于进取，大力革除本民族落后旧习。不但使本民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对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因篇幅有限，只收录了北魏孝文帝和蒙古耶律楚材的改革为例。

掩卷思索，无数惊涛骇浪已成历史，无数刀光剑影已成

过去。当我们从书斋中走出，感受到的是一片温暖的阳光，周围是那样祥和、美妙，而又充满生机。原来，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该是多么美好！改革，已使我们的民族走向了繁荣，也只有改革，才能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然而，如何更深入地将改革进行下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一道难题。或许此书能给人们提供些许借鉴，能对人们有所裨益吧。

作 者

1995年7月于宛阳

目 录

出版者的话

前 言

商君雄豪 1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态在议一大难中推波助澜，并使秦国一跃而起，然而他本人却遭受了极为悲惨的车裂之刑。

以夏变夷 27

魏晋南北朝，中国再一次地分崩离析了，而鲜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却显得那样光艳夺目。改革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更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统一的到来。

昙花一现 55

寇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可谓切中时弊，但北宋的守旧势力太强大了，以至于新政仅存1年有余便夭折了。

安石雄危 73

北宋政权到神宗执政时，已是病入膏肓，虽有王安

石壁危数难，但仍未阻止其向垂死的边缘滑去。

晋用楚材..... 103

“楚材晋用”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才流动的普遍现象。13世纪初叶，中国又出现了一位“晋用楚材”，那就是生于金却为蒙古所用的契丹后裔耶律楚材。

人亡政息..... 124

明朝末年，张居正又使濒临灭亡的封建肌体重现一片生机，但很快随人亡政息。

洋务新风..... 152

当封建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的时候，沉睡的中国人被惊醒，于是乎，引起了一股洋务新风。

戊戌喋血..... 175

国耻使爱国的志士奋起，于是改革封建政体的维新运动应运而生。但是，变法何其艰难，戊戌英雄的血流成了河……

主要参考书目..... 199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态在这一大潮中推波助澜，并使秦国一跃而起。然而他本人却遭受了极为悲惨的车裂之刑。

自从夏启建立了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之后，奴隶制最终在中原大地上确立起来了，商周时期，达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宗法制度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在原来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制度下，全体宗族成员为族长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时期，就发展成了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度。

西周时候，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高贵显赫，威震四方。他为了更好地统治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处，同时受封的还有周的功臣、亲戚以及尧、舜、禹三王后代，这样就形成了西周时期非常有特色的塔形的分封制度。周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宗法等级

即嫡长子继承制来维护统治，即天子之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只能受封为诸侯；各诸侯国中也是嫡长子为继承人，其他儿子只可以在国内做大夫；大夫也同样往下传，其他儿子只能为士，嫡长子享有土地的继承权。这样天子是大宗，对于天子来说，诸侯是小宗，而对于大夫来说，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树干分成无数树枝，树枝又分出叶子。层层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于塔顶，号令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又统辖士，位于塔底层的是千千万万穷苦的奴隶。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诸侯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卿大夫对诸侯承担从征、纳贡等职责，士也要对卿大夫承担各种杂务。如此明确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号令诸侯，一统天下，出现了奴隶制空前的繁荣。但是，就在统治者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强化奴隶制统治以为江山永固的时候，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做为奴隶制掘墓人的新兴的封建因素正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并不久取而代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血亲关系越来越淡薄，亲情逐渐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时国势衰弱，各诸侯国却势力逐渐膨胀。公元前 770 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东迁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了，西周时期的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历史进入到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

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土地关系井田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田就是把土地分为方块，以栅栏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是领主的土地，私田

是分给奴隶的。分得私田的奴隶首先要无偿地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份地。待秋收时节，领主的公田收成是领主的财产，而奴隶却还要由私田所得向领主交纳粮食、织麻等等。到头来，奴隶所剩无几，他们由衷地发出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慨叹！但是，尽管奴隶主的盘剥较重，但奴隶毕竟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现，这种自由越来越大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奴隶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种完毕，于是奴隶们开始渐渐地开垦一些荒芜的土地，日久天长，私有土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奴隶主贵族感到已再难以将奴隶束缚在井田之上了，于是开始改变剥削形式，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并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劳役地租。这样就出现了自由民阶层，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转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由此，维持奴隶统治的井田制破坏了，封建因素悄然诞生了。

就在封建制度已见萌芽之时，各诸侯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却不能世袭侯位的卿大夫和士们开始不满于现有地位，他们从自由民那里买得土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这一阶级自兴起之日起便迅速发展壮大，并急于登上历史的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们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开始成了社会的主角。为了使国家走上富强，称霸诸侯，他们面对新的社会局面，在国内纷纷实行了改革。

率先改革的是齐国的管仲。管仲将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征税，同时，把全国划分为21个乡，并设了鄙、属、县、乡、卒、邑等各级地方组织，这样就将原来的宗法关系一变

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齐国经过改革之后，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公元前594年，鲁国也宣布“初税亩”，即按拥有土地的亩数征税。此外，晋、楚、郑国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在政治上实施一系列改革，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为地主阶级发展创造条件。这样，齐、晋、鲁、楚、郑五国都通过改革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愿望，成为春秋五霸。

战国初年，三晋、齐、楚等国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进行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魏国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国有名的君主，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选贤任能、网罗人才，其中李悝、西门豹、吴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识，并重用实行变法的人。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胆地提出了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利益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以军功的大小给予官吏俸禄，并重视以法致用，作《法经》，加强王权统治。与此同时他废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并提出丰年向农民多征粮食以备荒年之用的“平余法”。李悝的变法使魏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战国第一雄。继此之后，南方的楚国也企图富国强兵，启用了魏武侯时被大臣王错排挤的吴起进行变法。吴起也是从废除旧贵族爵禄、并废除官吏世袭这些十分尖锐的问题着手，怎奈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太强大，改革仅一年，吴起就被杀身亡。但是，由于吴起在楚国很注重养兵，使楚国的军队也日益强悍。

东方各国风起云涌的改革之势，使国家都变得强盛起来。他们都跃跃欲试，企图威震一方，完成统一霸业。所有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国感到岌岌可危了。

秦国原是位于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由于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列为诸侯。春秋时候，当晋

国称霸之时，秦国也很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但几次东征，都出师不利。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国牢牢地扼制住，无法向东迈进，便开始向西发展，去征服邻近的戎人，开疆拓土，依山河之险，成了西方的霸主。战国初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公元前408年，秦国也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劳役地租，叫“初租禾”。公元前378年，又开辟了市场交易，即“初行为市”，使商品交换活跃起来。秦国虽然有这些变动，但是比起东方各国却落后许多。

此时，东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强盛起来，并直接威胁着秦国。吴起在魏国时，就训练了一支充满战斗力的常备军叫“魏武卒”，公元前409年，吴起奉魏文侯之命领兵攻打秦国，一举攻下秦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魏国在那里设立西河郡，秦国失去了洛水以东的土地。楚国自吴起改革之后，将整顿机构和吏治节省下来的钱作了加强军备之用，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并开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胁着秦国。

就在魏、楚兵强马壮之时，秦国不但没有富国强兵之策，反被极大的内忧所困扰。秦国的奴隶主势力十分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自从秦躁公（前443—前429年）死了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着国家的政权，他们争权夺位的斗争接连不断，国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机作乱。秦怀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长毚逼死，立了秦灵公。灵公死后，他的叔父发动宫廷政变，篡夺了君位，即秦简公。简公时，秦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虽有“初租禾”这一税制改革出台，但一时很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秦简公死后，儿子惠公即位。秦惠公为了抵御强魏的进攻，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曾三次进攻魏国，并曾出兵韩、蜀两国，树立了一定的国威。惠

公死后，儿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仅两年时间，公元前 385 年，庶长茵改杀掉了出子，立灵公之子公子连即位，这就是秦献公。

灵公死后，秦简公篡位，公子连被迫流亡魏国长达 21 年之久。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看到了魏国是何等的国富兵强，而想起自己贫弱的祖国，心里便时时感到悲怆。回国后，他决心仿效魏国，发愤图强，着手整顿国内事务，以改变秦国长期以来的内忧外困、贫弱落后的局面。他首先废除了在秦国实行了 300 多年的杀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户籍制度，即把人口编户，五家为一伍，从而形成了新的基层行政单位的雏形。他还在边疆设立了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封地的 4 个县，并把都城由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东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以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影响和便于向东发展。秦献公的这些措施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变法氛围，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打下了基础。秦献公初步改革之后，秦国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后，秦国曾打败了韩魏联军，并曾深入魏国境内，一次斩首魏军 6 万人。可以说献公时，秦国达到了初步的繁荣。

但是，尽管如此，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国内矛盾还十分尖锐。在外交上，秦国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视为夷狄之列。并一直被摒弃于诸侯盟会之外。就是在这种国乱、兵弱而主卑的情况之下，公元前 362 年，献公的儿子渠梁即位，这就是秦孝公，一个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英明的国君。

公元前 362 年，对于秦国人来说，是既悲伤又欢庆的一年。悲伤的是他们失去了献公这样一位很久没有出现了的比

较好的君王，欢庆的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新的国君即位了。

孝公登极不久，便在全国各地贴出诏令：“想当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间，修德行武，东与晋国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为后世开辟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后来经过历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混乱时期，内忧外患，使三晋夺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诸侯国都鄙视我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献公即位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目的在于向东扩展势力，以恢复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亲未尽之事业，常常痛疾于心。现在各位宾客群臣，如能有谁献出妙计，使秦国强盛，我将给予他高官，封赐给土地。”这就是孝公的招贤令。人们看到了这个招贤令后奔走相告，议论纷纷。秦国有史以来奖励功臣，从不赐给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许，足见其富国强兵的决心以及思贤若渴的急切心情。于是人们纷纷向孝公献计献策，各国有才之士也都纷纷投奔秦国。商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约前 390—前 338 年）原是卫国没落宗室贵族的后裔，他本姓公孙，名鞅，又名卫鞅，只因后来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陕西商县东），才被称为商鞅，号商君。年轻时的商鞅就极热衷于法家学说，曾经潜心研究过管子的法学思想，他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并梦想着能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当时卫国是魏的属国，魏国经改革之后国力强盛，欣欣向荣，这使年轻的商鞅对魏国充满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国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朝气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后不久，商鞅便怀着大展宏图的志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魏国。

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变法的魏相公孙痤的门下，做了他的执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使公孙痤将自

已推荐给惠王。在那里，他刻苦学习李悝的著作《法经》，并注重研究李悝、吴起的政治主张和改革实践，准备待惠王重用他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

然而不幸的是，当公孙痤还没来得及推荐商鞅的时候，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魏惠王听说后，特来探望，他见丞相生命垂危，心里很是难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伤心也无益，他便向公孙痤请教后事。惠王问道：“万一爱卿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国家将由谁来辅佐呢？”公孙痤挣扎着说道：“我有个家臣，名叫公孙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后君王将国家托付给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听，觉得很奇怪，心里想公孙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怎么会让我把国家交付给他的一个家臣呢？所以他没有作声。公孙痤看惠王沉默不语，知道惠王一定是觉得商鞅年轻，资历浅，又没有名望，因此不会重用他。于是他又让身边的人都退下，对惠王悄声说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千万不能让他逃出魏国，否则日后必成魏国之患。”这一次惠王点了点头，看来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对商鞅说：“刚才惠王问我谁可以为相，我说你可以，王沉默不语，表明他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因为先君后臣，于是对他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这次他答应了我。现在你赶快逃走吧，以免遭杀身之患。”商鞅听了以后，不但没有害怕，反倒还笑了笑，他不慌不忙地说：“大人让他重用我，他不听，大人让他杀了我，他也不会听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觉得商鞅乃是一无名小辈，不必伤他。此事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领秦国的军队打到魏国城下，他才如梦方醒，后悔没听公孙痤的话，当然